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唐宋《文选》学史论

丁红旗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唐宋《文选》学史论



丁红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文选》学史论/丁红旗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061-6

I. ①唐… II. ①丁… III. ①《文选》-古典文学研
究-唐宋时期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0194 号

责任编辑 时润民

唐宋《文选》学史论

丁红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2 插页 4 字数 456,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061-6/I·1395

定价 75.00 元

2011 年度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文选》唐宋写、刻本研究”（项目批准编号：11YJC751016）

序

曹 旭

一

1984年我考进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跟随王运熙老师学习《诗品》，王老师开的书目里就有大量《文选》类的书。王老师好像是一位老中医，欲治《诗品》，用的全是《文选》的药方。因为《诗品》、《文心雕龙》是“文选”家庭出身的兄弟；刘勰、钟嵘走得再远，“先秦汉魏六朝文选”仍然是他们共同的家园。

二

我所钦佩的《文选》研究家，除了众所周知的老一辈学者外，还有和我交往的当今学者，如许逸民、俞绍初、王立群、傅刚、清水凯夫、游志诚诸兄，此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所有研究《文选》的人都比我对《文选》有研究。

我和许逸民先生在黑龙江开会的时候同住过一个房间。我们都对《金楼子》、徐陵、庾信感兴趣；他学问比我好，但午睡的时候，我比他睡得快，打呼噜也比他响。他说，他睡得快和呼噜响原来是没有对手的，现在认识了我，成了他的劲敌。他对《金楼子》、徐陵、庾信的注释都成了我研究时重要的参考资料。

几次在台湾开会，与俞绍初先生同行。俞先生很低调，说话声音不大，但学问扎实，郑州大学因为有了俞先生和他的团队，而在六朝文学研究方面名声卓著。新引进的刘志伟教授，也是当今《文选》研究的重要

一家。

傅刚教授是我曾经的同事，他是上海师范大学著名魏晋南北朝研究专家曹融南教授的大弟子，是现在社科院文学所吴光兴研究员嫡亲的师兄。曹融南教授一共指导过三个研究生，其中就有傅刚和吴光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曹老师教我本科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课；当时学校里就传，中文系来了一个“很厉害”的研究生，叫傅刚。我们在一个教研室工作，在一个办公室里开会，在一个篮球场上打球。一次我打篮球过于勇猛，破了眉角，血流不止，他扶我去医务室包扎，兄弟深情，至今难忘。现在他是北大教授，国内有数的《文选》研究专家。

我和王立群先生互相心仪已久。他在《文选》上卓有成效的研究，使我对他的关注，比他在“百家讲坛”开讲而引人瞩目更早。我是最早赞扬他在《文选》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的人之一。上次在河南大学开《文选》会议，他问我《文选》能不能像《诗品》一样做集注？我当时的回答有点保守。去年，他获得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文选》汇校汇注”，我们的项目同时紧挨着公示在国家相关网站上。

三

虽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骆鸿凯就竖起了《文选》学大旗；但真正对《文选》展开系统性的研究，建立专学，还是要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喜人的研究新进展，如1988年在长春召开了第一届《文选》学国际研讨会。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了《文选》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等有影响的专著。河南大学文学院专门开设“《文选》学”课程。一些大学学报开设《文选》研究专栏，如《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广西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社版），都显示了当代《文选》学研究的勃勃生机，一枝枝不教花瘦。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理念更新，藏书和读书人可以更亲密地接触，其中海外汉学的发展，特别是出版业的兴盛，珍稀的古籍得以大量影印，人们能较方便地见到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都是春气勃发的基础。

2010年，在清水凯夫及游志诚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许逸民先生在

《“新文选学”界说》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提出“新文选学”的研究路径和未来发展方向。为研究者提供法门，促进了《文选》学的深入发展。近十年来，随着青年学者生力军不断加入，《文选》研究更呈现强劲发展的势头。在骆鸿凯开启《文选》学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已真的成了一门学问；《文选》会议的论文集总是“大丰收”；在《文选》的版本、文字、注释、义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但研究正未穷已，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傅刚在《21世纪“文选学”研究展望》[《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一文中提到的：“由于各种原因，如研究者的学术积累还不够，目前研究的水平并不能令人很满意”，“但总体说来，(对《文选集注》的)研究还不深入”。他对《文选》研究的总体评估是正确的。因为《文选》不仅是一部专书，更是一部自周秦以迄梁代一百三十位作家、七百多篇作品的总集，本身就是一部文学史，一部百科全书，内容繁多，博大精深。其版本散在大陆、台湾、韩国、日本，且数量众多，仅版本搜集，就不是凭一人之力能完全做到的，可见其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

四

丁红旗博士素怀远志，敏而好学。2002年在河南大学跟随王立群先生攻读硕士时，即开始《文选》的研读之旅。在王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文选》文本，勤奋学习。所谓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是他正确的起点。2005年，他考入四川大学，在跟随罗国威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习、研读敦煌所藏的各类《文选》写本，接触《文选》刻本的面也更加广泛。2008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做博士后，在刘永翔教授的教导下，以《五臣注〈文选〉研究》作为报告题目，开始潜心研究《文选》的阶段。2011年，选题《〈文选〉唐宋写、刻研究》获得了教育部青年项目的立项，使研究又推进了一步。如今，摆在面前的《唐宋〈文选〉学史论》一书，就是他跋涉下的新里程，称之为十年磨一剑不为过也。

为了更好更深入研究《文选》，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各种《文选》版本。十多年来，他从河南、成都、北京、上海到南京，不断用心收集各种写、刻本资料，如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刻本五臣注

《文选》，即从其师罗国威处复印。他留心各种出版信息，节衣缩食，以购买各种《文选》版本，如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周勋初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中华书局出版)、《日本足利学校藏明州本〈文选〉》等。同时，更留意新的学术信息，如《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011年又出版了增补本，傅刚先生指出了其遗失了三残叶，即《石井积翠文库》所藏卷第六十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中《李都尉从军》残叶，和宫内厅藏卷四《南都赋》残叶以及横山宏所藏《南都赋》首页残叶(《〈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与整理》，《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等。

五

在搜集版本以后，丁红旗博士第二步是对各种《文选》写、刻本进行个案研究。如通过《文选钞》中特定的地域称名，引用《汉书》颜师古注，比较李善、《钞》、陆善经等对晋朝史书的征引，推断《文选钞》的作者是公孙罗，并论证其“杂抄”的性质。对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永青文库所藏《文选注》，通过考察其避讳，推断写卷的年代在中唐，认为此写卷应是当时学生的课堂笔记，不是注释底本。由此推衍，对其他写卷的性质，都一一加以论证。如其《敦煌吐鲁番〈文选〉写本叙录》一节，能让人明了整个敦煌写卷的特点、抄写时代，以及写卷传入敦煌和敦煌当日的情形。对宋代刻本，除了尽可能剖析刻版的背景、特色外，还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证，如秀州本、明州本删削(“某注同”)，及明州本的初刻时间，都在广泛征引史料、详细考辨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这些对写本刻本时间、性质、特色和价值的讨论，无疑把《文选》的研究推向新的维度。

在对写、刻本进行个案研究以后，丁红旗博士还对《文选》进行综合研究，即勾勒、概述唐宋时期《文选》学发展的历程。这种勾勒、概述分两个层次：

一是对一些看似细小、微不足道但却较为重要的问题，如《秋胡变文》中秋胡携《文选》一事，李德裕“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以及对虽有一定研究，但还不甚清晰的《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中杜甫和韩愈化用《文选》的事；以及对唐代省试诗赋对《文选》的借鉴和利用等，进行了考辨。

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文风的转变、社会文化氛围、地域特色等，

综合论述唐代《文选》学的发展,如:陈隋时代《文选》学中心在江南的形成及其北移;随着进士科试诗赋的稳定,在中唐的大历、贞元期间形成了一个广泛阅读、借鉴《文选》的高潮;从当时影响较大的理论著作,如旧题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以及《赋谱》等,论证《文选》在中晚唐士人间的读习和兴盛;《文选》学在北宋中后期衰落,以及五臣注《文选》在南宋以后逐渐退出士人的关注视野,等等。上述各种考论,都见出了作者的辛苦努力。

因为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所有论述都来自第一手资料,因此十分扎实,一些观点能发别人所未发,如《唐代科举与〈文选〉学的关系》一节的论证即是佳例。

对唐代科举与《文选》学的关系问题,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如饶宗颐的《唐代文选学述略》,许逸民的《论隋唐“〈文选〉学”兴起之原因》,刘青海的《试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及其和〈文选〉的渊源》等,但这些仅论初唐,仅论省试诗,未涉及赋作,对由此带来《文选》学兴盛的时间,没有作明确的界定,使人误以为《文选》学在初唐就十分兴盛了,其实不然。

有唐二百九十年间,唐代科举与《文选》的关系,是一个跨度很大的论题,要一一清晰爬梳整理并非易事。对此,红旗悉心阅读唐代关涉科举的著述,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以及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唐代基层文官》等,潜心研究唐代进士一科的发展历程、应试特色等,并以此作为一个宏阔的背景,重新审视和梳理《文苑英华》以及孟二冬补正、徐松著《登科记考补正》所载原始材料,查遗补阙,一一排比省试采录《文选》诗文的诗题,并尽可能地考订出时间;同时,对省试赋也进行梳理。然后两相结合,得出唐代大历贞元年间,是一个广泛借鉴《文选》、截取诗句命题的高峰时期,影响所及,也自然形成了一个读习《文选》的热潮。这样的结论自然能令人信服。

在此基础上,作者再审视唐武宗会昌四年(844)李德裕“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问题,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贡士时“诗以齐梁体格”评判问题,对其做出较深入、准确的解释。读后令人又惊又喜。附带对唐代山水

诗的兴盛、“齐梁体格”等，作者也作了细致的考辨，使得内容厚实且有张力。这一节共五万多字，真是不容易。

总之，既弄清真相，解决问题，揭示规律；又材料扎实，不作悬空高论，是这一专著的特色，也是其人治学之特色。

六

红旗博士研究《文选》，一如玄奘入印度取经，为取得真经，必须历经艰难。如《圣教序》所言：“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其“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其能获得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出版资助，正在于此。虽然现代社会诱惑很多，但现在国家重视学术文化，如学人立志选择了学术，且与之相结合，就最容易心想事成。

我对《文选》没有专攻，只是粗粗涉猎。但对《唐宋〈文选〉学史论》的出版，由衷地感到高兴，对其将给《文选》学研究带来裨益深信不疑。而且，从永翔兄邀我主持红旗博士后出站，结下缘分，到作此序，时光又如水一般逝去四年，泰戈尔《游思集》第12首正写出了我的心情：

你像湍急而曲折的小溪，载歌载舞；轻快地奔流，你的步履在歌唱；

我像崎岖而陡峭的河岸，缄默无语，山峰一般，忧郁地注视着你。

曹 旭

2015年4月19日于伊莎士55号樱花飘尽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陈隋至初唐时期的《文选》学·····	18
第一节 陈隋间文风的转变以及《文选》的沉浮·····	19
第二节 隋朝的《文选》学·····	31
第三节 《文选》学中心在江南的形成及其北移·····	46
第四节 初唐李善注《文选》的考察·····	59
第五节 《文选钞》的撰作时间、作者及性质考订·····	73
第二章 唐代科举与《文选》及《文选》学的兴盛·····	101
第一节 试论唐代科举与《文选》学的关系·····	104
第二节 李详《杜(甫)诗证选》、《韩(愈)诗证选》的再审视·····	156
第三节 《秋胡变文》中秋胡携《文选》事考释·····	176
第四节 中唐时敦煌一地的《文选》讲习·····	184
第五节 从诗格、《赋谱》等看《文选》在中晚唐的读习·····	195
第三章 抄本时代的《文选》注·····	225
第一节 吕向生平考释及五臣注的产生·····	227
第二节 《文选集注》中五臣注与《文选抄》比较·····	239
第三节 敦煌吐鲁番《文选》写本叙录·····	246
第四节 日藏三条家本五臣注《文选》考论·····	262
第五节 综论：从李善注到五臣注·····	271

第四章 宋代《文选》刻本的流传	293
第一节 宋代《文选》刻本考略	295
第二节 《文选》在两宋时期的流传	327
第三节 从《文选》文本看早期刻本间的传承关系	350
第四节 关于陈八郎本《文选》价值的一些考察	375
第五节 综论:《文选》五臣注在宋代的淡出	395
附录	
附录一:《韩诗证选》、《杜诗证选》条目补充	417
附录二:宋人笔记中对《文选》的评鹭	449
主要参考书目	491
后记	497

绪 论

文章总集的编撰发端于魏晋,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文章总集就是西晋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此后,一直到隋,三百五十年间,总集的编撰一直蔚为兴盛,这由《隋志》所载高达两千余卷的数目就能清楚地看出。汇集秦汉以来诗赋碑铭等佳作的《文选》称得上是硕果仅存的一种。《文选》在梁中期编成后,就在士人间广泛传习。可能出于对先人的敬重,以及家学的累积,最早对《文选》进行音释的是萧统的侄孙萧该,这一支系有习文的传统。萧该在西魏攻克江陵后入北,《文选》学也就带到了北方。这时,距《文选》编纂成书的梁普通(520—526)年间^[1],已有半个世纪。不过,与王褒、庾信等备受尊崇、立任高职相比,萧该可能并未受到重视(也可能是年龄较小的缘故),据“甚为贵游所礼”推断,初期可能仅是游走于权贵之门。但亲情却也让背井离乡的萧该备感温暖,至少在可考的被驱掠入关的人中,王褒是鄱阳王萧恢的女婿,也是萧该的亲姐夫,王褒当时颇受亲幸,周太祖曾对王褒说:“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2]可以想见王褒一定会尽力照顾、提携萧该。留居北地的皇室萧氏一族,如萧宝寅、萧正德、萧撝、萧督等(具体见第一章的相关考证),也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或提携。之后,另外一位著名的《文选》学者就是曹宪,约生于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前后。隋时,“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至迟在大业九年(613),曹宪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江都,并教授《文选》,“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3]。这样,大约就形成了两个《文选》传习中心。一

个是北方关中一带,后来,约在上元年间(674—675),李善在“郑、汴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4],这可能得力于萧该打下的基础。一个是南方扬州一带,即南朝旧都附近,大约是耳濡目染,后又在扬州江都人曹宪的推动下,徐淹、李善、公孙罗等人读习、互相辉映而形成了江淮间的《文选》学圈。比较之下,南方的《文选》学较为兴盛,从梁末到显庆三年(658),一百年间出现了一系列的《文选》学著作,如萧该《文选音义》二卷、曹宪《文选音义》十卷、公孙罗《文选音决》、徐淹《文选音》十卷等,又有当为众人所撰、钞略而成的《文选钞》^[5]等,这种现象在学术史上也较为罕见。这两个《文选》学圈曾一度互相辉映,但在武后时期,南方的《文选》学圈已渐趋衰落,学者流寓、充实到北方的《文选》学圈,并表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也由此拉开了唐代《文选》学兴盛的大幕。

从历史上看,《文选》学的兴盛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唐宋,一个是明清。但这两个时期的功绩是不一样的。唐宋时期,《文选》学属于创立、发展阶段,这包括对《文选》的音训、注释等方面,是注释学的高峰时期,以及时人接受和《文选》经典化的历程;明清更多的是考证、辩驳史实、品评和鉴赏,这表现在数量较多的《文选》评点,这是在唐宋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注释、串释文意以及审视、发掘《文选》的丰富内涵。《文选》在唐宋时期的兴盛,仅从杜甫教育他儿子杜宗武时说的“熟精《文选》理”以及宋代的俗谚“《文选》烂,秀才半”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中间,强有力的推动因素就是科举。从永隆二年(681),诏令进士开始试杂文两首,到大和八年(834)专用诗赋的定型,其间共经历了一百五十四年。就是在这一时期,因《文选》对诗赋,甚且杂文的有效指导,以及诗赋的命题多出自《文选》,时人对进士科的热衷,士人读习《文选》的劲头一直久盛不衰。某种程度上,《文选》充当了科举教科书的角色。大历十二年(777)黎逢试《通天台赋》时擢为状元的逸闻轶事^[6],足以让时人看到模拟《文选》范文(其文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五十),不妨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终南捷径。再如,省试诗中,山水、景物描写共141首,占50.2%,山水、写景的诗蔚为大宗。这种写景诗集中的情形,在《文选》也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文选》中“诗”类共十三卷,二十三小类,共454首,其中,仅以山水诗著称的谢氏家族的人,如谢混、谢灵

运、谢惠连、谢瞻、谢朓等人的诗共 74 首，就占《文选》选诗的 16.3%。显然，《文选》中的诗歌能构成一种有力的借鉴。因此，沿袭到唐末，《文选》仍被看重，“齐梁体格”甚至在一个时间内还上升到选士、拔擢的钦定标准。

整体上，从隋到唐玄宗时期，《文选》学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因此，为《文选》作注、音释就一直络绎不绝。但就在兴盛之际，已有不同的声音，这肇端于中唐的李德裕，李德裕“恶其不根艺实”，而后“不于私家置《文选》”。^[7]不过，这只能是个人一时的愤激之言，影响有限；但到了唐末五代，就明显不同了。唐末的李匡乂首起对五臣注的发难，在《资暇集》中专列一条，用了近两页的篇幅，归结出五臣注的弊端，“方悟所注尽从李氏注中出”。其后，五代人丘光庭更激昂蹈厉，在《兼明书》中以二十条、一卷的篇幅例举五臣注的错误。这种责难延续到两宋，经由苏轼谓五臣“陋儒”的苛责、洪迈所言的“狂妄注书”、再到王应麟正面肯定李善注“详且博”^[8]等的推波，几乎成了定案。客观地说，大体上，李善注详于名物训诂和故实出处，属汉学的范畴；五臣注则重文义的串释。意旨既别，作用当然各异，实不可如此苛责、求全。

宋时，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1041—1048）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但随着《文选》与科举的剥离，欧阳修对“险怪奇涩”文风的打击，唐代诗赋创作的丰富积累，可资借鉴的作品急遽增多等因素，以及对苏轼文章的推重，《文选》的热潮开始渐趋退却，但也实际上开启了南宋士人比较理性地审视《文选》的态度。保存的各种笔记中评鹭《文选》的条目，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清代，朴学风气下，学者大抵着眼于探求、勾稽《文选》注中的名物、训诂，或作为辑佚的渊藪（品评、鉴赏性的《文选》评点除外），有时甚至不遗余力地对五臣注倍加贬斥、挾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几近根深蒂固的观念：凡今存李善注中的错误，都说是“五臣乱善”；凡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的地方，也都是五臣“臆改”的结果——棍子都打在了五臣的身上。如颇

负盛名的胡克家《文选考异》，在宋玉《风赋》中“中风人口动之貌”，就认为“袁本、茶陵本无‘人’字”，“此误取五臣济注中字增多，非也”。这自然不能以理服心。实际上，这个问题追究起来，并不是这么简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李善注本非仅是单一的显庆三年(658)上的注本，而是有多个注本，这也在事实上造成李善注本不同的面貌。世上没有无因的果，也没有无果的因，一个简单事实就是从开元六年(618)，到约明德二年(935)至广政十六七年(953—954)毋昭裔相蜀时刊刻的第一个《文选》五臣刻本的出现，再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深谙出版风向的坊刻本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的版刻，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长河中，五臣注一直处于较为兴盛的位次。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其间的原因。

时到今日，我们仍不得不肯定清儒在音韵训诂、校勘、删注评点、诗赋选编等方面对《文选》所作出的研究实绩。^[9]但也不得不承认，因未能目验到一些珍稀的《文选》刻本，特别是宋刻本，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国子监本、秀州本、明州本、陈八郎本等，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论述的价值。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胡克家《文选考异》。清嘉庆十四年(1809)，江南布政使胡克家约请当时著名的版本学家顾广圻、彭兆荪对尤袤刻本校勘后重刻，并完成了《文选考异》十卷。胡氏据以校勘的本子即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吴郡袁褰嘉趣堂覆刻宋裴氏本(简称嘉趣堂本)、元大德三年(1299)古迂书院刊刻的陈仁子《增补六臣注文选》(简称茶陵本)，以及可能不无残缺的影尤袤刻本。这种做法，虽比四库馆臣据明毛晋汲古阁本得出“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未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四库提要》)要可信得多；但因尤袤刻本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注释中较多地杂有五臣注，以及李善注本身就有多个注本，使得其校勘的成果打上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近代，即骆鸿凯和周贞亮的《文选学》^[10]。许逸民先生称之为“‘选学’研究的水分岭”，骆氏有“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文学史家的意识”。^[11]但随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并行，带来的更多的是《文选》研究的寒冬。倒是在毗邻的日本，出现了一个《文选》研究的新气象，在新发现的抄本、刻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基

基础性研究,这方面首推斯波六郎博士。斯波博士一共较为全面、细致地比较了他所能见到的三十三种《文选》版本——其间就包括新近见到的敦煌写卷《西京赋》和《文选集注》,撰成了《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一文^[12],时间在1959年。这不能不令人叹服。斯波博士的论证、结论甚为详尽、谨慎,至今仍受学者的征引和推崇。之后,冈村繁先生《文选之研究》^[13]和“新文选学”领军人物清水凯夫先生对《文选》的一些考断,都值得学人深思和借鉴。

当代,大陆《文选》学的研究日趋规范和深入。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文选》学会”的成立,以及1988年^[14]、1992年两次在长春,1995年在郑州连续召开的研讨会^[15]。之后,在俞绍初先生的带领下,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了《文选》学研究中心,且出版了《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16]、《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等有影响的专著,并还明确提出“《文选学研究集成》丛书”的宏大计划^[17]。许逸民先生更在日本学者清水凯夫以及台湾游志诚先生的基础上,高屋建瓴,提出“新文选学”的具体研究路径和未来发展方向^[18],能有力地指导《文选》学的未来。2012年7月,为迎接河南大学的百年华诞,王立群师多方努力,筹备、组织召开了第十届《文选》学会,与会者济济一堂,各抒己见。至于个人进行的全面研究,首推北京大学的傅刚先生,1993年至1996年,其在中国社科院师从曹道衡先生研习《文选》,后于2000年出版《昭明文选研究》(曾获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一书;接着,又入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的门下做博士后,在前续的基础上,潜究《文选》的各种版本,完成《文选版本研究》^[19]一书。此书在构建《文选》研究的根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第一次让人较全面、系统地知道了《文选》的各种版本,及其流衍、传布的情形,实能代表着二十世纪《文选》版本研究所能达到的整体高度。当然,在版本的深入探讨方面,苏州大学范志新先生的《文选版本论稿》^[20]也功不可没。除对版本做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外,研究更深入、成果较多的是对《文选》的编者、时间、编撰标准,以及与《文心雕龙》等关系的研究。这中间,研究卓著者是王立群师,曹道衡、俞绍初、穆克宏、清水凯夫、兴善弘、胡大雷、力之等诸位先生也都有深刻的论证。王立群师《现代〈文选〉学史》^[21],着力回顾、